



左芙蓉 著

基督教 与近现代 北京 社会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左芙蓉
著

基督教 与近代 北京 社会

本书出版得到北京联合大学的资助，也得到香港特区政府研究资助局拨款资助完成（项目编号：450407）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与近现代北京社会 / 左芙蓉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5

ISBN 978-7-80752-359-8

I. 基… II. 左… III. 基督教史—北京市 IV.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3297 号

基督教与近现代北京社会

左芙蓉 著

策划组稿	段志洪
责任编辑	谢正强 周文炯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http://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成都上翔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0.75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359-8
定 价	2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绪 论

本书所论述的基督教主要指新教，它与天主教、东正教构成基督教三大派别。在论述新教与近现代北京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对新教在世界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新教兴起于 16 世纪，它伴随一系列宗教改革而产生和发展。首先是 16 世纪 20 年代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德国发起宗教改革运动，迅即在整个德国形成燎原之势。随后是在瑞士的茨温利（Huldreich Zwingli）和加尔文（Jean Calvin）等人推行的改革，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新教的影响。英王亨利八世由上而下进行的宗教改革，也很快使新教在英国占据主导地位。到 16 世纪中叶，在欧洲已经形成新教的三大主要宗派，即马丁·路德创立的路德宗（亦称“信义宗”）、加尔文创立的加尔文宗（亦称“归正宗”、“长老宗”）和作为英国国教的安立甘宗，它们同罗马天主教相抗衡，否定天主教会的至高权威，主张信徒直接与上帝沟通而无需神职人员做中介，教会制度应多样化而不是强

求一律等等。从地域分布来看，路德宗主要分布于德国大部 and 北欧诸国，包括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归正宗分布于瑞士、荷兰、苏格兰和德国的一部分地区，安立甘宗主要分布于英格兰。

在以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新教又产生出更多的宗派。除路德宗、归正宗和安立甘宗三大派以外，还有卫斯理宗、公理宗、基督复临派、普救派、救世军等以及基督教的组织青年会和女青年会等。

卫斯理宗由英国神学家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创立，此人出生于英国林肯郡一个圣公会牧师家庭。1714—1724年，他先后在伦敦查特豪斯学校和牛津大学基督教学院学习。大学期间的卫斯理就“非常注重灵性生活，与几位朋友在一处同读书，念圣经，做礼拜，并一同作服务的工作”^①，他曾经在牛津大学学生组织的圣洁会中担任领导人，因该组织主张按其所认为合乎《圣经》的教训，过循规蹈矩的生活，该派因此被戏称为循规蹈矩者，该派的正式名称——循道卫理宗也由此而来。1726年，卫斯理成为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研究生，两年后被按立为牧职，任助理牧师。1735年，卫斯理与其弟查理转向北美传教，因成效甚微，3年后回国发展，在布里斯托尔建立了第一所循道教堂，并巡回露天布道，还深入到矿工中传道，宣传自己的宗教主张，因此在下层群众中获得了支持。以后，卫斯理的传教活动大有发展，影响扩大，他希望在英国国教范围内开展传道活动，被伦敦主教拒绝，他还期望伦敦主教任命

① 《华北基督教宗教工作研究会会刊》，1941年，第85页。

该派成员去北美传教，也未能如愿，导致该派与英国国教分裂。1784年，卫斯理自行派送牧师前往北美，同年组织“百人大会”管理本派事务。1795年，该派彻底脱离英国国教，成为独立宗派卫斯理宗。该教主张只有将纯真的信仰与虔诚的生活结合起来，才能得救，强调自身内省与圣灵的工作，同时关心社会问题和社会改良，要求废除奴隶制，倡导公共教育，致力于法制和监狱改革等。

卫斯理宗主要在英美两国发展。在英国，卫斯理宗与国教教会分裂后，在工业区中下层群众中发展较快，后来曾陆续分裂为几派，20世纪以来重又聚首，1932年联合组成不列颠与爱尔兰循道公会。美国的卫斯理宗主要由爱尔兰移民传入，南北战争时，因废奴问题分裂为美以美会和监理公会。卫斯理宗在加拿大也有影响，1874年加拿大循道会成立，1925年和其他非主教制宗派联合，组成加拿大联合教会。

1847年以后，卫斯理宗各派系从英美陆续传入中国，并在各地建立教会，名称各异，如监理会、圣道会、循道会、遵道会、循理会、福音会等。1939年，美以美会、美普会和监理会在中国合并，统称为卫理公会。

公理宗起源于16世纪的英格兰，由英国人布朗（Brown）首倡，他主张各个教堂独立自主，由各教堂的教徒公众管理，得到一些独立的教徒的接纳和认可，逐渐形成一个新宗派。英王伊丽莎白一世时，该派受到迫害，不少成员逃亡到荷兰。英国长期国会时期，该派信徒回国，形成与长老派对立的独立派，并日渐活跃，共和国时期还有所发展。1620年，一批英国移民乘坐“五月花号”帆船抵达美国，公理宗随之传入北美。

公理宗主张个人信仰自由，认为凡承认耶稣是我主这一基本信仰者，即可参加教会；由于教会主要不是一种组织，而是一种灵性生活的共同体，因此不必设立统管各教会的上级领导机构，只须建立由各教会自由参加的联谊性机构即可；全体信徒在教务会议上对教会事务行使平等权力。公理宗建立的教会主要有公理会、浸会等，这些教会在近代均传入中国。

公理会最初在广东被称为“纲纪慎会”，是其英文 Congregational 的译音，后来改称“公理会”，也称为“美部会”，因为在美国公理会中有一个国外布道部，“美部者，美国布道部也”。

基督复临派创立于美国，其创始人为美国人威廉·米勒 (William Miller)，因其相信基督即将第二次来临而得名。米勒原为浸礼会牧师，他凭着自己对圣经的长期研究，推算出基督将于 1843 年 3 月 21 日或 1844 年 3 月 21 日第二次降临，但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坚信其预言的信徒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信徒没有遵守旧约律法所规定的以第七日为安息日。1845 年，基督复临教会出现于美国新英格兰，随后不断发展。1855 年在密西根成立总部，1861 年正式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该派着重宣传末世论，认为世界已近末日，基督不久即将复临，创造一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新世界。他们强调必须遵守安息日，主张唯有通过信仰才能得到救恩。后来该宗派分化，出现来复会等，它们于 20 世纪初期传入中国。

普救派出现于 18 世纪，1756 年由英国人雷利 (James Relly) 创立，1770 年开始影响美国。该派主张基督的救赎是普及全人类的，故称普救派。19 世纪初，普救派制订了共同信守的基本条款，内容主要有：上帝是全人类的天父；上帝之子耶稣基

督是人们的灵性权威和指引者；《圣经》具有上帝的启示；各人之罪都将得到公义的处理；所有人的灵魂最终都将回归上帝的怀抱。进入 20 世纪中期，美国普救派与一位论派合并，成立美国一位论普救派协会。

救世军乃循道会牧师卜维廉（William Booth）所建，1865 年创始于伦敦，初名基督徒布道会，早期主要是在伦敦东区即贫民区向那些闲散的、不参加礼拜的失业工人传道，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宗派和服务团体，从事促进基督教信仰、促进教育、救济贫弱者以及其他对整个社会及人群有益的慈善工作。救世军发展很快，1880 年出现于美国，它以帮助城市中信教和不信教的贫穷居民为宗旨，“深入贫民窟集中区，创办医院和贫民救济所，组织儿童俱乐部，建立各种社会救济机构等”^①。卜维廉将他的布道会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其传道人 also 采用军职，“总部设于英京伦敦，支部遍设于世界各国，军内首领有二，一为神界首领，即众所崇拜之耶稣，一为世间首领，即军中大将（或称总指挥官），大将之下，复有委任之军官，执掌军中事务。1878 年 8 月 13 日，于伦敦公布救世军之组织法，全军在各地一切设施，皆以此为准则”^②。救世军在 1916 年开始进入中国。

青年会全名为基督教青年会，1844 年由英国人乔治·威廉（George William）创立于伦敦，英文名为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 YMCA。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大量的农村青年涌入都市，到工厂谋生。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得不到充

① 王旭：《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42 页。

② 兴亚宗教协会：《华北宗教年鉴》，1941 年，第 349 页。

分的休息，更没有正常的娱乐生活，许多人沉溺于酗酒和放纵堕落的生活。乔治·威廉创立青年会，其初衷是改善青年人的精神状况。会员们最初聚集在一起，一是祷告，二是研究圣经。后来除了宗教生活以外，还开展教育和娱乐等活动。伦敦青年会设有图书阅览室、社交室、体育活动室、经济餐厅和简易宿舍等。这种既宣传福音又提供文化娱乐的组织颇受青年欢迎，很快出现在英国其他城市甚至传播至欧美。1855年8月，“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在巴黎成立，1878年，会址由伦敦迁往日内瓦。自19世纪后期，青年会进入中国并产生，影响至今。

女青年会全名为基督教女青年会，英文名为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 YWCA，1855 年出现于英国伦敦。当时，受欧洲工业革命及克里米亚战役的影响，欧洲青年女子开始远离家乡到工厂谋生，或随护士南丁格尔（Nantingale）到战场服务。有一位热心的贵妇金纳德夫人（Lady Kennard）意识到这些青年女子的需要，就创办了一间妇女宿舍，使一些远离家庭的女子得到一个“家外之家”。另一位热心的女基督徒罗拔士（Emma Robarts）则经常集合妇女们举行研经班、祈祷会。1877 年，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其初期的宗旨是，组织青年妇女参加宗教活动，帮助离家自立的妇女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例如住宿、救济和贫困等。后来，它逐步发展成为培养妇女德行、参与社会活动、服务广大妇女的社会机构。该组织很快传遍欧美，1894 年，各国女青年会在伦敦举行会议，成立了“基督教女青年会世界协会”，会址于 1930 年迁至瑞士日内瓦。该组织对中国的影响始自 20 世纪初。

新教于 19 世纪初传入中国，被译为“抗罗宗”或“更正

宗”，中国的新教各教会则自称“基督教”或“耶稣教”。1807年，马礼逊受英国伦敦宣道会（简称“伦敦会”）派遣来到中国，被认为是新教传入中国大陆的开始。鸦片战争以后，新教各派如公理会、信义宗、圣公会、浸礼宗、长老宗、监理宗等纷纷组织差会来华传教。

其实，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并非始于19世纪初，之前已有过三次交往，最早是在唐代。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相关文献记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景教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从波斯来到唐朝都城长安译经传教。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较小的教派，此乃基督教入华之始。景教在唐朝兴盛一时，唐太宗曾资助景教僧人在长安建造了一座波斯寺（又称“大秦寺”）。唐高宗继位后，继续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致使各州设置景寺，寺满百城。但到了公元845年，唐武宗一反常态，下诏拆毁天下寺庙，并勒令僧尼还俗，景教亦未能幸免，其教士被逐，寺院被废。此后，景教虽在中国边远地带仍有活动，但在内地基本销声匿迹。

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已是13世纪下半叶蒙古族统一中国建立元朝之后。原来流行于蒙古、中亚一带的景教开始在中国内地恢复活动，与此同时，罗马教皇也派遣传教士东来传教，天主教进入中国。元朝时期，人们把在华的基督教各派统称为“也里可温教”。由于基督教各派都尊崇十字架，故当时人们又称该教为“十字教”，称其教堂为“十字寺”。也里可温教在元代得到迅速发展，大都（今北京）、泉州、扬州等地都建有“十字寺”，信徒人数增多。仅从大都来看，到1305年，传教士蒙高维诺（Giovannida Montecorvino）就已为6000人施洗。至1328年蒙高维

诺去世时，信教者达三万余人^①。为管理基督教事务，元朝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名叫“崇福司”的机构。由于也里可温教信徒大多是蒙古人和迁居内地的中亚人，它在内地居民中没有牢固的根基，随着元朝的灭亡，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又一次中断。

明清之际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自明中叶起，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相继来华，其中以耶稣会势力最大。此时的中国基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能进入内地传教。后来，是一位名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耶稣会士逐步打开传教局面，不仅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得到留驻北京的许可，使天主教在中国扎下了根。继利玛窦之后，来京的传教士不断增多，其中一些人因身怀技艺而得到朝廷的信任，参与修订历法，掌管钦天监。他们中的代表有邓玉函（Joannes Terrentius）、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还有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园林建筑设计、全国地图测绘等方面发挥特长。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传教士徐日昇（Thomas Pereira）、张诚（Hoannes Franciscus Gerbillon）还被清政府任用为译员。与此同时，大部分传教士还在各地传教，1664年传教士向欧洲报告说，“有30位耶稣会士在中国各省传教，连最远的省份在内。已成立的教士住院，有42处，圣堂159座，私立小堂多得不能计数，教友共计248180人”^②。后来，一场首先发生在中西教会内部、不久扩展至罗马教廷和清朝皇帝之间的礼仪之争爆发，导致清廷下令禁

① 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第562—563页。

②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7页。

教，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又一次受挫。

17 世纪下半期，东正教自俄国传入北京。此前，东正教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已有长时期的活动，但俄国政府正式派遣传教团到北京是在 18 世纪初。1716 年，第一批东正教传教士团来到北京，至 1860 年这一百多年间，俄国方面共派出传教团 13 批，来华教士 150 余名，发展教徒 200 余名。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第四次传入中国。此时的中国逐渐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清廷原来的禁教政策亦不得不取消。大批传教士来华，教会势力渐强，据统计，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前的 90 余年间，天主教来华修会有 30 余种之多，另外有 80 多个女修会。东正教势力则从北京扩展到东北、华北、华东和西北地区，仅东北地区就有教堂上百座，信众三十多万人^①。而新教传入中国的教派共有 100 多个。抗日战争以后，基督教各派在中国的力量又有新的发展。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天主教徒共有三百多万人，罗马教廷正式将中国天主教组织划分为 20 个教省（下辖 12 个总主教区、85 个主教区、34 个监牧区和 4 个自立区），有大小天主教堂 15000 座。基督教新教徒则有 70 万（亦说 100 万）人，分属 150 多个外国差会。其中，天主教和新教的势力和影响远远大于东正教，而新教又比天主教的发展速度更快，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从美国基督教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对比分析中找到一些答案。赖德烈认为，中国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存在着 11 个方面的不同。一、罗马天主教团体是新教的 4 倍和 5 倍。然而，新教

^①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96—197 页。

徒的增长却快于天主教徒。二、在某些方面，天主教徒比新教徒团结。他们的教义一致，在罗马还有一个权威中心。三、在中国，天主教不像新教那样，较早就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直到1924年，罗马天主教才聚集起来。而新教在1877、1890、1913和1922年都有集会。天主教在全国的教育、医疗和文字活动也较少。四、天主教和新教之间采用不同的宣传基督教启示的方法。新教传播的范围广，它主要通过印刷品、街道教堂、街头布道和其他形式的公共宣传。而天主教则几乎不向非教徒公开布道，在他们自己的教区之外很少分发宗教文献。五、天主教和新教的教育政策不同。前者强调对小孩和成人的宗教培训，并且开办了许多教义问答式的学校，学校的注意力主要在于为培养中国神父作准备。而新教总体不太注意儿童的宗教教育，它的重点在于皈依的经历上。新教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对俗人的普及教育上，特别是中学和大学教育，但它也不回避牧师的培训工作。六、中国的新教比天主教更接近世俗的运动。新教传教士中近一半是未按立为牧师的，而天主教男传教士近十分之九是神父。在这方面，新教可能更符合中国的传统，更能够吸引中国文人。七、新教比天主教更注重教育。最初，新教和学者也没有联系，然而在1900年之后，它努力接近新的学生阶层，因为它认为，新式学生是未来中国的领袖。男女青年会也使学生成为主要关心的对象。八、天主教和新教都从事慈善，但是慈善的类型不同。前者的慈善机构主要是孤儿院，它被看成是拯救灵魂的一种手段。天主教办的医院很少，也没有精力救济基督徒以外的灾难。另一方面，新教的孤儿院极少，其重点在医院和学校——两者都是既面向教徒、也面向非教徒。此外，新教徒也尝试减轻教徒和非教徒

的苦痛和打击。赈灾、禁毒、卫生、大众教育、反缠足、反赌博、反纳妾、努力改善劳动条件等，也是新教徒支持的事业。九、方法和重点不同：天主教致力于建设一个基督教社会，而新教的精力则分布在客观的和主观的基督教社会之间。十、资助传教事业的方法不同。天主教传教的大量收入来自在中国的投资，通常是土地和房屋。新教的收入主要来自中国和西方的自愿捐款，来自中国的医疗费和学费。当然，两者都依靠欧美的支持。十一、两个教会都开始适应中国，只是速度的问题。新教的速度快于天主教^①。

第四次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具有强权政治的背景，其在华传播也烙上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刻印记，因此引起的冲突也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自鸦片战争到 19 世纪末，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教案”就达 400 多起。1900 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更是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精神。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吴耀宗为代表的中国基督教（新教）爱国教徒联名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新教）教会和团体割断与外国差会的关系，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地办教会。同年，以中国天主教神甫玉良佐为首的 500 名教徒也发表宣言，倡议中国天主教会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随后，全国掀起了“三自爱国运动”。1954 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

①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Conclusion.

立，1957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宣告诞生。改革开放以后，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又分别举行全国代表会议，成立中国基督教（新教）协会和中国天主教团，分别作为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全国性教务机构，直至今日。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也是中西文化不断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其间伴随着冲突和碰撞，也因此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和探究。总的来看，外国学者对中国基督教历史的研究开始较早且较为深入，主要有法国学者沙百里的《中国基督徒史》（1998年），韩国学者李宽淑的《中国基督教史略》（1998年），这两本均为中文版。英文版本的论著有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1929），鲁珍晞（Jessie G. Lutz）编著的《基督教在华传教》（*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Evangelists of What?* 1965），刘广金（Kwang-Ching Liu）编著的《美国在华传教士》（*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1966），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编著的《在中国和美国的传教事业》（*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1974），裴士丹（Daniel H. Bays）编著的《基督教在中国》（*Christianity in China—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1996）等。

中国学者对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关注也不晚，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如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1940年）等。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基督教在中国大陆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即便有所撰述，也都是为了‘大

批判’的需要”。因此，“有关中国基督宗教的历史，鲜有成果”^①。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产生兴趣，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较具代表性的专著主要有，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981年、1991年）、杨天宏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1994年）、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1996年）、姚民权和罗伟虹合著的《中国基督教简史》（2000年）等。

综观以上成果，它们主要是对基督教在整个中国的历史考察，但对于基督教在各地的历史，特别是对基督教在北京的历史，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考察。20世纪末，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曾推出由陈月清和刘明翰合著的《北京基督教发展述略》（1998年）一书，对此缺憾有所弥补。但是，该书并不是北京新教史的专著，而是对基督教三大宗派——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在北京的传播与发展的综合论述。新教在其中的篇幅有限，不少问题的探究不够深入，也有一些较重要的问题未曾涉及。

新教传入北京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如果以1863年清政府正式解除对新教传教士的禁令那一年算起，基督教在北京的历史已有140多年，这期间又可以将1949年作为一大分界线，划分出前后两大阶段，即1949年以前为近代期，1949年以后为现代期。基督教在这两个时期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对北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本书尝试对它们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这一研究涉及历史学和宗教社会学等领域，一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将

① 李天刚：“近二十年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综述”，引自《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1期，第42页。

基督教自传入至今的演变与发展脉络加以梳理，论述基督教在近现代北京的发展轨迹及其原因。二要运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阐明基督教与近现代北京社会的互动。

新教在北京的历史仅一百多年，但其影响很大，尤其是在近代政治、外交、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为方便起见，本研究分为两大部分，即近代篇和现代篇。前者主要考察基督教在近代北京的传播及其相关活动和多方面的影响，后者重点探讨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做的努力。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深入研究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等理论问题，特别是对基督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其次，它有助于基督教史研究的深入。有关地方基督教历史的深入研究在目前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北京基督教历史的专门、深入、全面的学术研究几乎没有。因此，考察基督教与北京近现代社会的关系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第三，它有助于北京史研究领域的拓宽。有关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北京史和北京基督教史的很少。跨学科研究是当今世界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科学研究极力倡导和鼓励的，本课题尝试从历史学、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基督教与近现代北京社会的互动，其学术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